



南普陀寺
nanputuo temple

下
册

厦门南普陀寺 编

南 普 陀 寺 志

尉愔書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第二节 居士传

林宗载居士

林宗载，又名巖言，字允坤，号亨万，厦门塔头人。明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举人，万历四十三年进士。初任江西浮梁县令，为政清明。天启初年（1621）因治绩显著出任兵科给事中，后到户部、刑部任职，提升为户科都给事。时清兵犯边，负责守边之边防军其费用毫无计划，每月巡山防海的费用达29万两银子，他请旨查核，省去7万两，并上疏建议“因饷榷兵，因兵榷官”，议论条条有理，切中时弊。受到天启皇帝赏识晋升为太仆寺卿，代理主持太常寺庶务。崇祯即位时，凡是祭告祖庙、皇陵的大典，均由他安排，晋升为太常寺卿。后见朝政日非，急流勇退，疏乞终养。

明末，普照寺（今南普陀寺前身）原寺产多入豪右，以致钱粮不足以供僧众，岁入不足以供香灯，十分窘迫拮据。宗载一家崇信佛教，其次子林宜杓尝由一曾姓手中取得原普照寺田产一石八斗，因膝下无子，在普照寺佛前祈愿：“佛若有灵，使我举一男嗣，我愿以所得寺租入寺。”后果灵应得子，遂将水田交付住持了蕴和尚。后来，林宜杓去世，田契仍在林家。宗载为鼓励“达官贵人观者同有是心，肯日用羡余充入寺中而无贪诸缘以为福利”，支持佛教事业，于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三月特作《田租入寺志》，刻石立碑，并将原寺产田种一石八斗田段坐落、大小、佃户及岁入租粮一一开列于后。是碑为南普陀寺现存最早的一方碑刻。

不久，宗载逝世，时年七十，入祀乡贤祠。著有《观海堂平平编》，邑人湖广云贵总督蔡复一为之序。

池显京居士

池显京，字致夫，号念苍，中左所（今福建厦门本岛）人。太常寺少卿池浴德子。明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由顺天府中式举人。授和州（辖境相当于今安徽和县、含山等地）知州，罢革杂税，惩治污吏。因忤贪官巡按崔呈



秀，无端罢职。起补湖州府（治今浙江湖州市）通判，任内督运钱粮入都，沿途兵荒马乱，历尽艰险方始到达。转任怀庆府（治今河南沁阳）同知，时因有人告发显京湖州任上押解钱粮拖延期限，遂被解职去官。回厦门，依其弟显方学佛，往来于普照寺与虎溪岩之间。其本性温厚纯笃，经历沧桑后，皈依佛教，晚年更加喜欢谈论佛学，处处以佛家准则为人做官。他一生任职的和州、湖州、怀庆三个州府，都是富庶之区、丰腴之地，但显京一尘不染，每至一地，均袖风载月以归。家居闭门念佛，怀庆归来二年后卒。

池显方居士

池显方（1588—1652），字直夫，号玉屏子，中左所（今福建厦门本岛）人。太常寺少卿池浴德子，显京之弟。明天启二年（1622）福建巡抚南居益莅临中左所督军抗荷，对显方人品才学十分赏识。天启四年，显方由应天府中式举人，因见国事日非，遂以母亲年事已高，不参加礼部会试。

显方居乡优游林下，参禅乐道。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慕玉屏虎溪风光，并结庐隐居玉屏山麓，建玉屏寺（后改虎溪岩），延请高僧大德说法，六时与香炉经卷为缘，与名人雅士相唱和，往来于普照寺之间。工诗文，喜山水。早年遍游武夷、秦淮、泰岱，举山川磅礴清华之气，尽缩入毫楮间。晚年流连鹭岛山水，寻幽揽胜，所至皆有题咏，所作空灵飘忽，不可方物。海内名辈如黄道周、何乔远、曹学佺皆折节乐与之交。与同安蔡复一尤称莫逆。蔡复一为云贵总督，吟诗作文，一字未安，则鸿雁往返推敲讨论。

显方平生著作丰富，有《晃岩集》、《南参集》、《玉屏集》、《澹远诗集》、《李杜诗选》等书行世。吏部郎中、晋江林胤昌序其集云：“直夫冰璞枯骨，畔幅坊身，学绍青箱，韵高白雪，卓乎不可一世”。

施琅居士

施琅（1621—1696），清初著名将领。字尊侯，号琢公，祖籍河南固始方集镇。明天启元年（1621）生于福建晋江龙湖镇衙口。从小好抡刀舞棒，后得名师教习，武艺超群，又好从族人航行出海，习水性，识风信、海潮，能



独驾轻舟出海，劈波斩浪，如履平地。崇祯十年（1637），17岁，投郑芝龙门下，郑见其少年英伟，留在府中为亲从。时郑氏在安平（今晋江安海），自养精兵三万，船舰千艘，纵横垄断东南海域航运，权势显赫。明皇室朱聿键在闽组建隆武小朝廷时，倚郑氏权势，召封郑氏为极品重臣，并赐封其子郑森（郑成功）国姓。施琅长郑成功三岁，两人相处，意气相投，欢洽无间。

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清兵大举犯闽，隆武政权覆亡，郑芝龙退守安平镇。清政府派贝勒博洛南下伪以闽浙两省领地相许，诱郑氏投降。郑芝龙为自保实力，不听郑成功苦劝，遂带施琅等亲从北上降清。施琅随郑芝龙到福州，郑芝龙立即被请进大营幽禁，清政府还将郑氏的随从另禁外营，断绝其与部下联系。施琅见情况有变，便设计脱逃，潜回安平镇，回奔郑成功。时郑成功见父北上投清后，便收拾其父旧部在安平镇誓师起义抗清。见施来归，即授左营先锋要职，命其亲带兵舰往来闽粤边海地区，募兵筹饷，施琅屡建战功。后施琅又为郑成功设计诱杀厦门暴虐守将郑联，从而取得金、厦两岛为抗清义师根据地。郑成功据厦后，南明桂王永历帝封其为延平郡王。由是威名大振，内陆各地抗清义士纷纷渡海来归。义师阵容日壮，郑成功之郡王权威也随之大增。郑治军严明，深得属下诸将崇服尊畏，唯施琅自恃当年与郑成功私交，遇事常对其犯颜直谏，使郑每感有失权威，而生猜忌之心。

顺治七年（1650）岁末，郑成功将率兵南征潮汕，施琅以时机不利当面谏阻，郑怒其故违将令，夺左先锋之印。越岁郑回师后，令施率兵一万进取漳州，漳城守将据坚固守，施几度猛攻，均被城头强弩擂木击退，施琅乃采用围城绝粮之策以待城中自乱。郑在厦见施琅久攻不克，正疑虑间，忽得施营标兵曾德前来告密，诡称施与城中守将有旧，围而不攻，放纵部下潜逃降清。郑听信谗言恐其生变，即派万年英领兵取代，召施返厦。施琅得此猝变，惶恐不安，自带亲兵三百返厦待命，听亲从密报曾德来厦进谗，乃勃然大怒，遂令亲从连夜诱捕曾德。原来曾德先前在施营中，因散布怨谤主将攻城不力之言，被施所闻，畏罪潜逃来厦恶人先告状想先发制人谋害施琅，故在郑前进谗谰言。

次夜，施开帐见曾，喝令先行杖责再讯，众兵恨曾卖主，加重剧棒，竟



将其击毙杖下。时郑忽闻施琅连夜捕曾，急派人传令要施琅将之释放。及郑兵到时，曾已被毙杖下，来人见状传郑令后，复赶回报郑，称施当面违抗将令，已将曾击杀。郑闻报大怒，急令右先锋黄廷领兵围捕施琅。施在府中闻之，急从后门逾墙逃跑，黄见施逃，急忙派兵尾追搜捕，并将施父大宣及弟施显解押回营缴令。

施逃脱出府，即沿厦门曾厝垵后山巉岩草莽间奔逃，及见郑兵沿山搜捕遂转入山坳间一处荒草丛生之野洞内躲藏，并在此潜心诚念观音菩萨圣号祈求菩萨救危解难。不久，闻听追兵已到洞口，其中一兵正拟搜洞，忽闻另一带兵将说：“不用搜了，洞口蜘蛛结网完整无损，必定无人进洞，时候不早，将速往前追。”施闻洞外郑将对话，深为骇意，许久后洞外再无声息，知追兵已远去，感念菩萨之救护。至深夜施琅乃出洞，乍见洞口蛛网密布，完整无损，更信为菩萨显灵救难，当即跪地谢恩，并许善愿称：他日若重返厦门，必当建寺供奉。此乃为他后来创建南普陀寺立下契机。原来施琅从小随家人崇奉观音菩萨，每随家人出海，偶遇风险，船上诸众均诚念菩萨圣号以求解。经此劫难得脱后，信念更加专诚。此后在其军营或兵舰上均供有观音、妈祖，晨夕焚香礼拜。

施琅脱险进入内陆，潜至安平镇拟请郑成功叔父郑芝豹代向郑氏求情排解，后闻其父、弟均被郑杀害，方知不可挽回，芝豹亦劝他离开安平镇另谋出路。施至此只好投奔同安降清。

施降清后，得到清廷重用，初授为同安副将，后迁升至同安总兵，领兵固守闽南海防，强兵固垒，与郑师隔海相对。郑闻施在同安作为，不敢轻视，又得知时有施氏旧部，偷渡过海投清，为恐部下众多闽南本土兵将军心不稳生变，从此不再轻易进扰内陆，转而集结兵力于两岛，连内陆唯一固守的基地安平镇，也自毁府第、城堡，撤回金、厦，准备另辟江山。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，郑成功亲率舰队北征，一路乘胜沿江直达南京城下，但却由于骄兵轻敌，使清廷得以暗中调集兵马，四面突击，沿江郑军船只大多被击毁，迫使郑大败回厦。

郑败归后，重新收集兵舰，准备东征收复台湾。清廷立国之初，只重陆



战，未立水师，更以西南边境未定，无暇顾及东南海患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下令对江、浙、闽、粤沿海诸省施行“迁界”，强迫数千里沿海居民内迁30里，造成沿海大片无人区，以断绝内陆人民对郑师的粮饷供应。许多不愿内迁的居民纷纷渡海投奔郑军，郑成功乘此时统帅大军及移民攻取台湾，驱逐占据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。郑成功复台后，不到一年，便因积劳成疾，不幸英年早逝。其部下将领陈永华等便即来金、厦奉请郑经回台继位。不久，留守金、厦的郑军也先后撤守返台。

郑军撤守金、厦据台后，清廷为加强海防建设于康熙元年（1662）升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，令其操办水师，建设防务，充实兵舰设施，锻练水师队伍，以提高水师战斗力。至康熙三年（1664），水师已发展到有兵舰300多艘、水兵3万多人。为能在实战中锻练水师，施琅乃通过福建督抚向朝廷请令进攻台湾，不料首次征台却因海上突遇台风，无功而返。康熙四年（1665），再请命竟因同样遇台风而归。此后多次请命，均被闽督驳回或留而不发。康熙七年，施琅不得不直接向朝廷进表，详实陈述征台与巩固海防之策。清帝阅表后，对施才智大加赞赏，乃下旨召其进京觐见。

郑军复台前后，清廷曾通过福建督抚多次派人与郑议和，终因郑氏要求条件太高，始终没有谈成。于是在福建地方官员乃至朝廷内阁大臣，均存在“剿”与“抚”，“战”与“和”对立派系而争议不休。施面奏征台条陈，仍被发交部议，终因两派争议难定而搁置。康熙只好委任施琅为闲职京官，施如是闲居京都13年，得与朝中闽籍官员和主剿诸大臣相交往，其中泉州安溪籍内阁大臣李光地与施琅交往颇为密切。直到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施闻悉台湾郑氏集团在郑经病逝后，诸家兄弟因争夺王爵，分立门户，相互斗杀，后由握有重要兵权的刘国轩拥立幼年的郑克塽继位，以此给了施琅攻取台湾之良机，乃拟定征台用兵策略，上奏朝廷。在李光地等诸大臣支持保荐下，康熙准奏，令其仍返福建，复任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。施回闽后，统率水师分别在平海、东山诸岛整顿兵舰，充实军需准备出师，但却由于与闽督姚启圣意见不和，多方受其掣肘，乃密奏朝廷，准其专权征台，获准后，终于在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六月，亲率精兵2万、兵舰300艘从东山岛扬帆出师，

直取澎湖诸岛。

台湾刘国轩闻知施将发兵征台，料其必先攻打澎湖，乃在澎湖湾沿岸布置海兵，严阵以待。一见清军舰只逼近，即万炮齐发，发动猛攻。施在炮火纷飞中，亲自指挥，兵舰往来冲突，虽一度被弹片击中左眼，血流满脸，仍坚持指挥，令旗不倒。清军虽损失惨重，但见主将施琅如是坚毅、勇猛，更是前仆后继，猛烈还击，终于突破缺口，冲上澎湖岛。刘国轩见势不妙，即收拾残兵退回台湾。

施攻取澎湖后即亲自写信给刘国轩劝其来降。原来施、刘同在郑军时，曾两相倾慕，交情颇厚，故施琅在给刘信中，追叙旧情，并陈述当年去郑降清之原由，指明如今清朝一统全国，大局已定，固守孤岛必无出路。又再三声明，此次征台，绝非为报杀父弟私仇，如郑氏率众来归，决定一个不杀，确保来降者身家生命安全。刘、郑原恐施征台为报私仇，必将滥杀郑氏家族，及读此信疑惧尽消，乃决定与郑克塽捧藩王印信亲到施军投降，并引施进岛。

施进台后，对郑氏集团及其家族来降者，均以优礼相容，特别是还亲往延平王祠拜奠郑成功，众人莫不为其不计私仇、宽宏大度而赞叹。

施平台后，于当年自奉旨亲带郑氏家族及其上层人物进京面圣。施进京后，向康熙面奏平台情况，为有功将士请封，并为归降郑氏陈情，康熙也为施之大义忘私所动，盛称“郑为明朝忠臣义士，非我清之叛逆贰臣，理当受人尊敬”，当即下旨，厚葬郑成功并封其遗族子孙敬职厚俸，发落山西定居。降将刘国轩得施特别保奏，受到朝廷重用。

施琅平定台湾后，朝廷内部又为弃、守问题争议不休。开始，康熙也抱无所谓态度称：“得之于我无所益，失之于我无所损”，而施琅据理力争，谓：海岛为闽之门户屏障，失之必为外人所得，若是则将使闽浙海疆永无宁日，民无安时；海岛土地资源丰富，移民屯垦开发，大可富国强兵。经此力争，朝廷方如施所请，派官建立一府三县，由厦门道管辖，又鉴于台岛初平，闽海民心未定，又派施琅回闽，复任水师提督加封靖海侯。

施回闽后，一度驻镇厦门。时厦门迁界未复，仍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孤岛，回到厦门，最使他萦怀不释的是当年遭郑军追杀，藏身野洞，感念观音大士

解救得脱，当空许愿未酬，故此一到厦门，沿当年逃难的荒山寻觅洞口，命人整理，亲自题匾称“观音洞”，并改此山为“观音山”，后又捐俸在普照寺废墟上重建禅寺，在大雄宝殿后建一座专供观音菩萨的大悲殿。按施本愿，拟将大悲殿与观音洞、观音山连成一气，将厦门本岛营建成南海普陀山第二观音圣地，故将在普照寺废墟上所重建寺院，改称为南普陀寺，并特聘漳州南山寺慧日禅师为南普陀寺第一代住持，慧日禅师是为南普陀寺开山祖师。也由此，施琅可谓是启建南普陀寺的功臣以及这个寺院名称得来的肇始之人，功德无量。

施琅在厦门，积极组织领导恢复重建厦门工作，如派人四处招引被迫内迁居民回归故土，搭盖简易民房，安置归来无家的难民居住，并协助他们重建家园。同时开放“海禁”，修复港口码头，发展海外交通事业，经过10多年的苦心经营，终于使无人荒岛恢复昔日旧貌。

施琅任提督水师多年，见闽海平静，于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曾向康熙皇帝告老回乡，康熙再三慰留，直至康熙三十五年病逝任上，享年七十六岁。康熙闻悉，加恩追封太子少傅，谥襄壮，并特恩赐葬，还于泉州府学前建祠祀之。当时，“两岛八闽皆颂德”，纷纷为之树碑扬誉。十九都皆有“靖海侯”坊，阳义辅立康熙制诗句“上将能宣力，南纪尽风流”，同安等地立“绩光铜柱”、“泽普南天”、“勋高大树”、“泽沛甘棠”等牌坊，以表彰施琅的丰功伟绩。

刘子葵居士

刘子葵，福建惠安人。清顺治五年（1648）四月，子葵积极参与郑耀星反清起义。七月，起义失败，子葵被官府追捕，家属被拘禁，万不得已遁入空门，削发为僧，携一瓢一褐逃亡鹭岛，入住普照寺，与明光法师及厦门名士纪许国、纪保国等唱和交往。随后准备南下端州（治今广东肇庆）投奔南明抗清队伍，鹭岛名士纪许国为文送其行。在肇庆，永历帝朱由榔委任其为永川知县，就任一个月，有黄应杰据惠州背叛，子葵坚守永川县城，阻止黄应杰北上，惠州府所属各县得以保全。后以抗拒驻军扰民，愤然辞职，遁居潮州深山。后来，再度披缁入厦，复谋搭乘商船绕道海南岛转赴广西，投奔

南明政权。纪许国亦为文送之。后因桂林梗阻，引还途中遇寇被害。

纪许国居士

纪许国 字石青，明末清初福建同安后厝人。父纪文畴博学多才，明唐王时为中书舍人，擢翰林院侍诏。许国11岁入学，后随父师从黄道周时，已著有《丁史焦书》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参加福建乡试中举，与同榜举人林说、林尊贤共著《同岑草》一卷。清军占领福建后，于顺治四年（1647）随父避居厦门。郑成功召为幕僚，未应召。但他心系国家命运，在厦门与流亡寓公交往，每年阴历十月十八日，必穿戴整齐，到南普陀向北遥拜。在厦门15年后逝世，时年四十一岁。其他著作有《吾浩堂诗文集》等。

纪保国居士

纪保国，字安卿，明末清初福建同安后厝人。纪文畴季子，纪许国之弟。保国为明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举人。清顺治四年（1647），随父兄徙居鹭岛，时与普照寺明光法师及刘子葵、阮旻锡等青年志士来往唱和，忧国忧民，怀亡国之痛，悲歌当哭。明亡后保国常闭门著述，将忠愤忧愁之意，寓于诗文，日取父兄遗著闭户编辑。后来，纪保国投迹空门，落发披缁，携一瓢游行五岳。同里林霍为序以送其行，并序其诗，诗尤清隽绝俗，飘飘如其人。

黄日纪居士

黄日纪（约1708—？），字叶庵，一字叶三，号荔崖，福建漳州龙溪（今属龙海市）人，后迁居厦门。乾隆初读书于厦门万石岩西侧的醉仙岩（古人说它山势犹如仙人醉卧，故称之为“醉仙岩”，今之天界寺）。乾隆十二年（1747）以生员的身份被任命为特用中书科中书入京赴任。乾隆十四年，迁吏部。乾隆十八年，调兵部武库司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秋，升任武选司主事。日纪博学多才，工诗能文，娴于书法，又负有经济之才，莅官勤慎，为同僚所推许，值此春风得意、前程似锦之际，詎料椿堂仙逝，遂居家守制。因感悟世事无常，服除虽官檄频催，竟不复仕。

日记青少年时即崇信佛教，喜欢谈禅论道，在醉仙岩读书时，与山岩住僧月松为方外密友，两人晨夕盘桓，炉香茗碗，说法参禅，质疑辩义。乾隆六年（1741）相与谋于醉仙岩侧创建佛教寺宇，以明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南京右都御史傅钺曾在寺后顶峰巨岩摩崖题刻“天界”命名，称“天界寺”。之后日记虽再度出仕，即使燕闽万里，云树迢遥，但他对天界寺依旧音问不绝，时时供给接济。天界寺诸岩宇代有修葺，乾隆二十一年，还曾一度重修。

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，月松为纪念日记曾读书于山岩之经历与肇建寺宇之功德，乃于“天界”题刻巨岩下建一亭子，以日记之姓为亭名，称“黄亭”，并自为《建黄亭小引》刊勒于寺之大殿后摩崖上，以志山门盛事。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），日记再次捐金购田，以作为天界寺固定产业。月松又自为记云：“信官兵部主政荔崖黄公捐银壹佰陆拾两，创置斋田，坐落本寺左边，受种五斗；另铁窟内受种壹斗柒升。大小共拾壹丘，永为寺业，日后不许徒子徒孙典卖他人。住持僧月松谨识。乾隆叁拾贰年拾月吉旦勒石。”

日记曾与鹭岛之名士往来南普陀寺、虎溪岩、白鹿洞、鼓浪屿日光岩等寺岩之间，常与他们唱和诗篇。与南普陀寺住持景峰和尚，虎溪岩瑞峰长老，日光岩瑞球、惠航禅师等高僧均有密切交往，期间曾先后多次携友游览南普陀后山五老峰诸胜景，留题许多诗篇，其中有咏“五老峰”五绝一首，曰：

五峰如五老，耸峙入烟霞。毓秀钟龙象，丛林第一家。

此外还咏钟鼓山、六月寒、云窠、石笕等诗。

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，日记于市内凤凰山下建别墅以养老，该山虽不高，但古木参天，奇石林立，风景绝佳。别墅建成后，取名“榕林别墅”，日记常邀集诗人文士于此赋诗题咏自娱，并于山后石上题刻“古凤凰山”四字。时年已古稀，不久辞世，具体卒之年月等不详。

日记终生勤于诗文著述，为当时厦门诗坛首屈一指的诗人。薛起凤等“云洲诗社”诗人多出其门。平生著作丰富，有《全闽诗雋》、《榕林偶吹》、《榕林倡和》、《榕林汇吟》、《内史集》、《中樞集》、《龙江集》、《嘉禾名胜记》、《荔崖诗钞》、《归田集》等十余种。



蒋以德居士

蒋以德（1871—1940），法名瑞仁，原籍福建惠安崇武镇五峰社。清同治十年（1871），生于今厦门市大生里。其父蒋世华早年出国，旅居印度尼西亚，后来在侨居地另立家室，极少回国。其母为人宽慈和善，长期在家茹素奉佛，以德从小受其影响，笃信佛教，依南普陀寺住持转逢和尚受三皈依成为居家学佛之居士。为了精进学修，他在家腾出一间房屋，专门供奉观世音菩萨，作为个人修持道场。

光绪末年，以德年届而立，与兄以祥协议，愿往香港谋生，寻求发展，留兄在家中打理家业和侍奉老母。以德为人诚笃，刻苦耐劳，讲求信誉，深得同业和顾客的尊重和信任，因而其所专营的食糖进出口业务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大，同时拥有香港电灯和自来水企业大量股票，数年之间遂成巨富。后来，他在厦门又创办一家蒋以德药酒厂，并投资与人合股开办泰利轮船公司，将厦门所有业务交兄以祥掌管，以其所得作为厦门居家费用。

以德事业有成，更加热心佛教的建设事业。他在自家居宅之右修造一座佛堂，专供母亲住修。同时，倾资支持厦门大小寺院和宫庙的修建。其中由他独资或捐献巨资创建、重建、修葺的寺院建筑有南普陀寺大雄宝殿、大悲殿、法堂，妙释寺大念佛堂，普光寺殿宇僧舍，鸿山寺大殿楼屋，万石莲寺山门，宝山岩（又称董内岩，即今紫竹林寺）殿宇寮房，天界寺殿堂住楼，太平岩大殿，中岩佛堂寮舍，还有进明堂、碧山岩、同安梵天寺，以及由佛教徒住持管理的诸如城隍庙、东岳庙、内武庙、朝天宫、丹霞宫、福茂宫、养真宫、美仁宫、前园宫、圆山宫、龙潭宫、福海宫、潮源宫等道教或民间信仰宫庙。泉州、漳州一带佛寺修建，凡有所求，他也都热心赞助，而且喜欢独自承担一个建设项目。

据说以德居留厦门期间，经常到各寺庙参拜礼佛，发现殿宇僧舍或佛像需要修缮，便许愿捐资，向佛祖祷告，并卜杯求信，若得“信杯”即解囊助成。有时即在家中向观世音菩萨请示，布施多寡，概不例外，一般先由少数问起，须连续三次信杯，方才确定；如不能连获三杯，自觉承捐数目不够，继续添加，直至连续三杯为信。泉州崇福寺妙月和尚向他募捐天王殿经费，

以德从100元问起，直至5000元才出现三信杯，其数目正好与重建天王殿资金相符，真是无巧不成书！时人称之为“卜杯大善士”。

以德崇信佛教慈悲为怀之精神，除捐资修建寺院宫庙外，还广行善举，如创办义学（先后在内武庙、美仁宫、前园宫、福海宫、圆山宫等处开办义学），捐资助学，赈济难民，体恤孤寡，施医赠药等。有一年时疫肆虐流行，他在广东以巨资囊括当地全部治痧药物，运回厦门，免费供给中暑病人服用，救人无数。每年春节前夕，以德都购储大量粮食寄存米铺，赈济困难户过年。

以德慷慨好施，急公尚义，赢得海内外缙素四众的尊敬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其母病逝，厦门南普陀寺以及闽南各地寺院高僧大德闻讯，不召而集，聚首蒋府，为蒋母举行往生法会，入殓后还为其举办七七四十九天的功德大法会。出殡之日，海内外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执绋送殡活动，备极哀荣。为此，其母葬后，以德特将其母生前供奉的玉佛贡献给南普陀寺，供缙素信众瞻仰礼拜。并捐献巨资在南普陀寺兴建大法堂，把自己居家佛堂的玉佛也安奉于法堂上。

20世纪30年代末，以德重返香港，准备将其香港商务移交给长子蒋光标，自己告老返乡，颐养天年。詎料抗日战争爆发，日军侵占厦门。以德捐出巨款，支援抗日，发誓厦门不光复，不回鹭岛，绝不在日寇铁蹄下生活。40年代初，日军占领香港，以德亲眼目睹山河破碎，悲愤交集，于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）初舍报西归，时年七十。以德身高体胖，坐化时袒胸露肚，酷似弥勒，见者无不啧啧称奇。

闽南佛教界人士惊悉以德逝世，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诵经回向，深切悼念，寄托哀思。

苏谷南居士

苏谷南（1881—1959），法名福岩，福建晋江苏厝人。生于清光绪七年（1881）。年轻时离乡背井，南渡菲律宾马尼拉经商。后来故乡发生瘟疫，其父母双亲相继染疫去世，谷南回国奔丧，居家守制。后与华侨朋友投资鼓浪屿的房地产开发事业，在屿东填海造地建房。

谷南笃信佛教，年轻时即拜印光和尚为师，与王振邦、吴辰泗、李博用



诸居士均为其在家弟子，他们之间互称为师兄弟。谷南修持净土念佛法门，长期持斋素食。深信佛教善恶因果报应之说，认为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因而热心地方公益，对各项慈善事业均积极捐助。抗日战争以前，被荐举出任厦门华侨公会会长，先后受聘为鼓浪屿福民小学（今笔山小学）与闽南职业中学董事长、厦门民立小学副董事长。他将住宅前将近1000平方米的土地捐献给福民小学作为体育场。并应聘为泉州开元儿童教养院、泉州开元养老院董事长，捐资赞助泉州花桥善举公所施药局。同时资助家乡苏厝创办俭德小学（今群德小学），以便乡梓学子就读，居家储备常用药品，随时赠送左邻右舍。

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日军南侵，谷南举家避居香港，担任香港福建商会与香港福建同乡会合办的救济部副部长，积极救济流落香港的闽籍难民。民国三十年（1941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谷南变卖家中贵重物品，尽力资助闽籍难民回乡。

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），谷南将离港返厦，行前，侨领胡文虎准备设宴为之饯行。谷南闻讯，即对胡文虎谈及某画家生活窘迫，建议将欲为其饯行的筵席之资赞助画家。胡文虎如其言给以接济。后来，画家知道个中缘由，十分感动，想作一画致谢。谷南要求画家以古诗“乍看螳螂去捕蝉，不知黄雀在身边。猎人一射伤黄雀，虎噬猎人井里填”诗意创作。后来谷南常以这幅画劝告世人莫逞强凌弱，以为止恶行善的劝世宣传品。

谷南还曾捐资助印《泉州府志》。他恭敬佛教三宝，对鼓浪屿日光岩寺住持清智法师礼敬有加，是为之得力护法。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，弘一法师在日光岩闭关清修，谷南随即拜访结缘，弘一挥毫题写“惜衣惜食，非为惜财缘惜福；求名求利，须知求己胜求人”对联相赠。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），弘一俗家弟子、著名画家丰子恺从台湾来厦门，谷南会同厦门佛教界人士盛情接待，丰子恺画释迦牟尼佛像以赠。

抗战胜利后，医师林遵行欲募资重建与谷南、黄钦书15年前创办的鼓浪屿医院，谷南不但带头捐资支持，并且鼓动菲律宾、香港亲朋好友解囊襄助。

谷南还曾捐资救济陕西省灾民，陕西省政府主席、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深为感动，特书赠联。



1959年谷南病逝于鼓浪屿寓所，终年七十八岁。

周醒南居士

周醒南（1884—约1948），又名宗温，广东惠阳（今属惠州市）人。生于清光绪十年（1884）。早年就读于两广游学预备科，毕业后任广东乐昌阳春师范学校教员，秘密参加惠阳辛亥光复斗争。宣统三年（1911）九月十九日，惠阳宣告光复，醒南受命赴广州领军饷。他不顾地方秩序混乱及兵匪骚扰，独自一人乘坐小船到东莞石龙起水，冒险沿广九铁路沿线步行，抵达广州城，将5万元大洋安全押运回惠阳。

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，醒南一度出任漳州官产事务局、工务局局长。他特地聘请留学日本后再入上海中国公学专攻理科的同乡冯重熙，到漳州襄助规划市政建设。其在任期内，对漳州市政建设颇多贡献。如：加固年久失修的九龙江堤岸、修建漳州有史以来第一座公园、扩建街道、整顿市容、拆除低矮的房屋、街路两旁一式改建双层骑楼，使漳州市容市貌大为改观，并建成漳州至石码全长20公里的福建省第一条公路，还筹备、规划建设漳州至厦门的公路。

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，经友人推荐，醒南与冯重熙一同到厦门港海军司令部堤工部任职，着手整顿海堤、码头，规划市政建设蓝图。

醒南和冯重熙均笃信佛教，曾受密教灌顶。在厦期间，两人与厦门佛教界太虚、转逢、会泉、觉斌、大醒、芝峰、寄尘诸大德以及蔡吉堂、苏慧纯、黄秋声、虞愚等居士意气相投，交往甚密。他对厦门佛教建设也作出重大贡献，醒南任职堤工部期间，曾有人提出将南普陀寺全部山地充为南普陀公园之议，如此议实行，南普陀寺危在旦夕。醒南鼎力维护，以堤工部路政处名义出具证明书并附山地图纸，划定地界，明确南普陀寺林园区域，南普陀寺因此转危为安，缙素均颂其功德无量。

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，思明县（今厦门思明区）佛教会成立，醒南被推选为常务委员。次年，改任为第二届佛教会监察委员。

醒南也为厦门市中山公园的缔造者之一，具体负责选址设计建园。初时议将中山公园建在虎溪岩。后因有日本僧人拟强购荷庵作为布道所事件，遂

定址于荷庵附近一带建设中山公园。

荷庵所在地原为天界寺山下魁星河与东岳河交汇口的一个小岛，清初有僧人在此建庵种菜，架桥以通。乾隆年间，名士黄日记等喜爱此地景色优雅，在此结社，经常与诗友吟诗唱和，并刊刻《荷庵》诗集行世。

醒南建中山公园，依荷庵周边环境，因地制宜，遍置花草树木，修建亭台楼阁，并引水环绕其间，遍架曲桥以通，使游客既可驾舟揽胜，又可漫步于曲桥流水之间，观赏园林景色。使游客恍如置身江南水乡泽国之间。公园建成后，冯重熙曾设计一座狮子地球的园雕，园雕坐东向南，寓意在于唤醒中华民族自强，如雄狮猛醒，屹立于世界东方。但后人却附会认为地球即表圆“周”，狮子是为“醒”狮，置之南门者示“南”也，寓意周醒南立碑。“文革”中红卫兵更认为不应为资产阶级的周醒南立碑，乃将其砸毁，另建山水园雕。直至“文革”后，才又在公园南门右侧，按原形另外新建狮球园雕，以志纪念。

醒南于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离开厦门居香港，在港期间仍关心家乡建设，参与整治惠州西湖，兴办惠州医院，垦辟农场，倾心桑梓建设事业。民国三十七年前后，醒南与世长辞，终年六十四岁。生前曾自撰挽联，感叹自己坎坷一生：“人间何世，那可久勾留。最堪怜，五十年挣扎生存，士农工商军，宗宗做过；西土言归，真是大解脱。尤可笑，六七次流离迁徙，咸酸苦辣涩，件件尝齐。”

苏行三居士

苏行三（1888—？），福建厦门鼓浪屿人。生于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。清末民初，行三由英华书院毕业，入南京东吴大学，毕业后仍回英华中学担任英语与体育教员。行三出身基督教家庭，一度为基督教传道师。

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行三南渡菲律宾留学，获生物学博士，在菲律宾马尼拉中正中学任教。曾研究生命起源问题，遍读基督教《新旧约全书》，未能获得圆满解释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占领菲律宾，学校停课，行三与友人游览信愿寺，结识住持高僧性愿和尚。后在性愿指导下，阅读佛典《华严原人论》，大受启发，昔日疑问，顿然冰释。从

此与性愿法师结为方外交，过往相从，互相切磋佛学教义，不久即发无碍辩才，为其朋友演讲佛法。

1944年，行三正式礼拜性愿和尚为皈依师，受三皈依，为其在家三宝弟子，持斋奉佛。

抗战胜利后，行三返回厦门，先后在南普陀寺、妙释寺和日光岩宣讲佛法。其讲演，征引科学理论，解释佛经教义，深入浅出，明白易懂，许多知识青年受其引导，归入佛门。此举引起厦门基督教会的不满，要求其家庭劝彼离开厦门。于是他又返回菲律宾，在菲律宾马尼拉信愿寺与华藏寺继续弘扬佛法。

1952年，行三随同信愿寺瑞今法师，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。返菲后积极倡导组织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菲律宾分会。是年，应菲律宾远东大学邀请，为该校师生作三次有关佛法的学术报告，反响热烈。

1953年，行三在信愿寺又依性愿和尚为戒师受在家菩萨戒，成为在家修持菩萨道的佛教学者。所著有《八大人觉经讲记》、《四十二章经讲记》、《佛学浅释》等。其中《佛学浅释》获当代佛学泰斗印顺大师好评，在海外佛教界广为流传。后病逝于马尼拉，卒年未详。

陈敬贤居士

陈敬贤（1889—1936），福建同安集美（今属厦门）人。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胞弟。生于清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农历一月十三日。父兄早年旅居新加坡，开设碾米厂。敬贤随母本乡生活，7岁母丧与其嫂生活，12岁，嫂送其往新加坡与父兄同住，因父兄为生意奔忙，无暇照顾，常受店中雇员诬告欺凌，由是立志读书。

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其父经商失败破产，独自回国。陈嘉庚则在新加坡另起炉灶，重新创业。敬贤辍学协助兄长经营，生意日渐兴隆。翌年，因平素体质虚弱，加上过度劳累，染上肺病，一度回国调养，不久重返新加坡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回国完婚。婚后不久，因与庶母不和，携眷避居香港。不久重往新加坡协助其兄经营生意，经多年努力，生意蒸蒸日上，成为新加坡有名富商。



民国二年（1913），陈嘉庚为开发民智，改进社会，本着“以救国大计，端赖教育”的远大理想回国兴办教育，先后在集美创办中小学和师范、水产、航海等专业学校。敬贤受命回国协助办学，亲赴江、浙、赣、鄂、鲁等省考察教育，延聘教师。民国六年（1917）春，开设集美女子小学并创办织布厂。民国八年春，创办集美幼稚园。此时，胞兄陈嘉庚欲回国扩建集美学校和筹建厦门大学，电召敬贤南渡新加坡主持商务掌管公司各厂、店、园、栈业务。民国八至十年，他被选任新加坡华侨中学董事、道南学校总理。在此期间他攒积资金支持集美学校的发展和兴办厦门大学。民国十年（1921）十二月因日夜操劳患病回国调养，但仍然带病主持集美、厦门大学校务，兼监理陈嘉庚公司国内分行事宜。民国十一年五月病重，前往日本治疗。

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二月，敬贤从日本回到集美之后，健康状况仍然欠佳，力不从心，但他仍然尽心尽职，不断为工作操劳，主持集美校务。是年十月在该集美学校开设调和会，十一月组织集美学村委员会，在乡里推行戒烟禁赌，开办夜校教育失学青年，改造环境，讲究卫生。民国十四年五月，增设集美农林学校，亲赴天马山勘察校址，购置附近久荒田地，筹建校舍、牧舍、试验场等，翌年春季农林学校得以开学。敬贤为创办集美学校，为兴建校舍、筹划教务而呕心沥血，作出重大贡献，集美学校师生像尊敬陈嘉庚一样尊敬陈敬贤，称他为“二校主”

敬贤因长期承担陈嘉庚庞大的公司业务，再加上为振兴中国的教育事业而，日夜操劳，奔波忙碌，重病缠身，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十月，因病再次赴日本休养。民国十六年一月，由日本抵沪，四月迁居杭州。是年秋回厦寓南普陀寺等处养病。民国十九年，他集资创办禾山济兴农林公司，并移居禾山茂后村，过农村田园生活。由于健康每况愈下，只好闲居调养，潜心研究佛学。

在民国十年（1921）敬贤协助嘉庚创建厦门大学时，一有空他就经常去临近厦大之南普陀寺学佛诵经，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，太虚就任南普陀寺方丈。敬贤得以时相亲近，执经求教，师事大师。民国十九年，在大师支持下，捐献巨资就后山水池区兴建“须摩提国”、“阿耨达池”。太虚法师就任南普陀寺方丈期间，转逢和尚退为都监，转逢即在南普陀后山建“兜率陀院”，以

